

《赤心擎海：郑成功传》

# 为民族英雄立传 为历史正本清源

□徐国强 刘天天

郑成功是杰出的民族英雄，更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代表。为还原真实可信的郑成功形象，作家张培忠历时16年，深入上百处史迹实地踏访，系统研究近千种史料，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赤心擎海：郑成功传》。作品以全球史视野铺展叙事，完整勾勒出郑成功从儒家学子到水师统帅的人生轨迹，深刻阐释其忠诚品格、海洋意识与战略远见，将家国大义与赤诚担当熔铸于字里行间。近日，《赤心擎海：郑成功传》新书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文学评论界、史学界、出版界和新闻界的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这部作品展开研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何向阳对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她谈到，这部作品深刻呈现了郑成功的精神世界，彰显了其作为民族英雄的伟大格局与历史担当。“作者张培忠秉持宽广的文学视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创作出的《赤心擎海：郑成功传》可谓史料扎实、气象恢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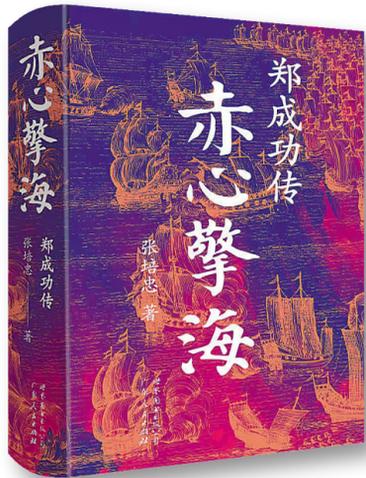
## 史笔熔铸英雄魂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谈到，为民族英雄郑成功撰写一部完整而有深度的传记，是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郑成功主题在当今时代尤为重要，其所牵涉的历史十分复杂，围绕他的历史论述从未停止，郑成功所开启的历史篇章尚未结束。”因此，该书在此时出现，是站在深厚的历史纵深中，面向未来展开的一条充满正气、充满中华民族信念与力量的历史脉络。他认为，郑成功的意义已超越传统民族英雄范畴，他是中华民族在大航海时代面对西方冲击的第一次有力回应。因此，该书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现实。李敬泽也坦诚地谈到，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在史学严谨与文学表达之间的“纠结”，并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期待。他建议张培忠未来可以再写一本以郑成功为中心、描绘17世纪东亚海上世界的著作。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将该书誉为传记文学的一部“大作品”，并从“六个大”的角度作了深入阐述。首先是作品所处的“大动荡”时代背景，即明末清初统治更迭、战事频仍、人际关系崩塌重组的复杂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内心世界的“大动荡”。其次是“大复杂”，这体现在家族与国家利益的交织、郑成功本人血脉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与多方势力关系的错综交织。再次是“大国族”与“大英雄”。该书体现了基于海权与战略思考的“大国族”观念，将家族自治统合于国家整体之中。由此，作者成功塑造了郑成功这位贯穿始终的“大英雄”形象，其气节与精神特质在结局处理中得到升华。最后是“大格局”与“大功夫”。作者以比史料更广阔的心胸观照人物，将其置于宏大历史象征体系中，展现了“大格局”。而“大功夫”则体现在大量文献考据、田野调查，尤其是亲赴日本查找、辨伪史料艰辛历程。他谈到，作品气韵贯通，兼具传记文学的真实与历史小说的生动，具备显著的影视转化潜力。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谈到，该书的出版是出版界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体现，展现了国家级出版机构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责任。“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历史、传承文化、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认为，若将郑成功置于传统戏曲的意象中，他必然是一位正气凛然、忠勇十足的“红脸人物”。他谈到，《赤心擎海：郑成功传》之所以感人至深，正是因为作者不仅生动刻画了这位乱世英雄的形象，更将“红脸”所象征的家国大义、赤诚担当熔铸于叙事之中。



《赤心擎海：郑成功传》，张培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12月

## 赤胆忠心映千秋

文艺报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认为，对郑成功的书写首先是一场“叙事争夺战”，是对日本等关于郑成功及台湾归属的不实叙述的迎头痛击与正本清源。其次，作品具有强烈的以史为鉴价值，书中记述的郑成功通过经济封锁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妥协、最终收复台湾的历程，对今天思考国家统一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他赞扬作者潜沉16年、纵横数万里、阅史近千卷的功夫，以及将郑成功置于国际战略视野的新叙事方式，提出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战争的完全胜利”。他认为，作品通过塑造郑成功始终不渝的忠义精神与浩然正气，生动书写其命运故事与复杂历史背景，使之成为一部担得起“厚重”二字的信史。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认为，郑成功作为杰出的民族英雄，其本身价值决定了这本传记的重大时代意义。作品具有新格局、新思维、新高度，将郑成功置于宏阔的大历史与国际视野中，并在真实性上实现了对历史结构逻辑和人物关系的深刻把握，即“逻辑真实”与“关系真实”。作品实现了传记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史料扎实，文采斐然，成功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形象。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彭玉平注意到该书在设计上的匠心，例如选用颜真卿书法题签与荷兰藏画封面，暗合精神传承之意。他认为，郑成功是从历史走向今天与未来的世界级人物。该书的成功在于将人物写“活”写“大”，并未回避其内心的矛盾与复杂，在历史与文学的张力中精准把握人物形象。他特别欣赏作者雅洁凝练、富有张力的文字风格。尤其是在台湾问题备受关注的当下，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兼具历史、文学与时代价值。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认为，该书是融合历史深度、现实关怀和艺术创新的力作。他着重谈了三点：一是在历史重构上，挖掘与建构并重，在学术发现与现实价值上均有新突破；二是体现了追求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的非虚构精神，堪称关于郑成功“最全面、最真实”的版本之一；三是通过艺术呈现，在复杂历史画卷中凸显人物精神，实现了历史人物的文学再现

止过，还诞生了“红学”。现在，邹世奇也来谈《红楼梦》，如果没有一定的自信，我相信她是不敢来蹭这个浑水的。

邹世奇的自信，来自她的学识。书中的这一组文章，大多能够独出机杼，别出心裁，言他人所未言，发他人所未发。同时又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成理，所以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肯定。比如，贾宝玉是不是“暖男”？作者在少年时代是有过怀疑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贾宝玉的一些行为有了理解，她意识到贾宝玉的那些行为并不是冷血，而是他的身份决定的。他是贵族，是孩子，是老庄哲学家，是诗人，基于这一认识，他那些看似冷血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读邹世奇的散文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村上春树的选择》这篇，乍看标题，读者定会以为文章写的是村上春树，实则不然。这就像相声里的“抖包袱”，标题只是一个引子，最后抖出来的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再如《性本爱诗词》一篇，作者认为，李煜的《木兰花·晚妆初了明肌雪》是人类自有文字以来最悲伤的文字之一，这出乎我的意料。这首词写于南唐全盛时，描绘的是李煜帝王生活中宫廷夜宴的盛况。当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定然不会想到日后会亡国、沦为阶下囚。如果没有后来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单读读这首词，我不会感到悲伤，只有两首对照着读，才能体会其中的悲凉。由此可见，作者的眼光非常独到，常在寻常文字中发现别人意想不到的深意。

苏轼论散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如今许多人写散文，自我标榜“行云流水”，实则脚踏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并非“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真正高明的散文，应如高手放风筝，既能放得出去，又能收得回来。邹世奇的散文可以说达到了某种程度上“行云流水”：表面风轻云淡，一派闲适，读来轻松自如，毫无紧绷之感；内里逻辑严密，收放自如，显示出高超的把控能力与结构功力。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福建省泉州市区大坪山郑成功骑马铜像

陈起拓摄

与精神升华。

《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王国平认为，该书提供了强烈的历史现场感。他还特别谈到该书的励志价值，认为其探讨了“人何以成人”的生命命题，展现了郑成功如何在时代巨变中打好一手“烂牌”、处理忠孝难全的抉择、最终成为精神图腾的过程。他引用后记中“烟火不息”一词，认为这体现了作家与书写对象之间的精神共鸣。

## 浩气长存天地间

中国作协创联部原主任彭学明概括该书是以郑成功为基点的国家叙事、以台海为核心的英雄史传。他认为，阅读该书能够增强当下实现国家统一的文化自信。“在艺术特色上，作品具有全景展现与立体塑造、史料扎实与驾驭力强、精神内核开掘与群像生动鲜活三个显著特点。”

《光明日报》文学作品版主编饶翔关注到了该书扎实的史学价值与叙事能力。他认为，作者颇具“良史之才”，既体现在史料的严谨考辨与取舍的功力上，例如对郑成功入国子监时间、死因等关键问题均作了细致辨析；又在叙事上语言深入，于繁复的历史线索中紧扣人物主线，脉络清晰。作品深刻展现了儒家文化对郑成功忠义人格的塑造，并运用“剖腹洗母”“毁容而死”等有力细节，将其坚忍决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荡气回肠。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治辰分析了作品强烈的爱国统一倾向，认为其根基在于对传统文化作用的强调、作者深厚的家园情怀，以及写作的分寸感。同时，还探讨了作品的文学性：一是采用“太史公笔法”，历史叙述始终围绕具体人物的命运展开，充满情感共鸣；二是战争描写周密详尽，展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科技的复杂关联；三是历史史识贯穿始终，格局宏大，资料详实，副线丰富，真正做到了“把人放到历史当中”。

《当代》主编徐晨亮认为，该书揭示了郑成功阐释权争夺的背景。在此背景下，该书以郑成功为核心、立场清晰的叙事尤为重要。他肯定了开篇从谈判桌前写起的巧妙设计，以及作品将郑成功定位为全球化先驱者的新视野，认为该书体现了鲜明的全球史视野，关注各文明间的互动。此外，他将

# “他们”从时间深处走来

——锦璐小说集《五秒钟是什么概念》读札

□李彬彬

勇，透出一股不容说服、不可征服的革命气息与战斗气质。延续了几代人的革命精神，如同基因密码般镌刻在出生于1970年代的锦璐及其笔下人物的性格中——热烈澎湃，又低伏挣扎。有信念者特有的执着、天真与激情，将城市知识分子的骄傲、爱恨、忧伤内化为毅然决然的反抗精神和顽强求生的坚韧品质，经过时间的淘洗，绽放出诗意的理想主义光芒。这正是她小说人物与怀旧叙事的精神原乡。散落在小说集里的《天上的街市》《爱，是不能忘记的》《喀秋莎》等艺术符号，及其所象征的醇厚、沉静、坚贞与明亮，赋予了作品和人物基本氛围与性格：一种沉淀于时间的恒久而深情的留恋与信念。总有一些神秘时刻，将这些沉睡的历史遗物唤醒，转化为神奇的托举力量，给命运投下一束星光。不可忽视的是，作者拥有正视历史与人性的意愿与能力，同时也深刻理解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所承载的复杂性、尖锐性。她试图写出隐藏在浪漫主义温情背后那些难以言说的痛苦记忆与历史创伤，写出人物在被抛掷的错位中无法释放的情感与纠葛。

作为女性创作者，锦璐多次“声明”自己并非女性主义创作者。这种否定，或许是因为她并未将某种主义置于创作之前，以立场先行；或许是有意回避女性主义创作在不断生长、不断被阐释，却又不断被概念化、对立化的矛盾中被轻易定义；又或许，某些困惑与困境本就不只是两性之间的，而是所有个体共通的。但无论如何，女性形象在锦璐的创作中始终占据绝对主角的位置，她给予了她们更多的眷恋与偏爱。相比之下，她们更为丰饶勇敢，拥有更幽深的秘密与更多的牵绊。与其说她们更为艰辛地熬过了命运长河中的颠沛流离，不如说她们更善于从荒谬中捕捉那一点点道理，从生命深处汲取情感支撑，更善于在布满荆棘的命运中寻找微乎其微的馈赠，反反复复地向上生长。

与此同时，作者也冷峻地道出了普遍存在于男性性格中的某种情感障碍——对信任怀有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甚至与利益无关，仅仅是那份松懈与摇摆本身，便抽走了他们寻找的愿望与力量，也因此让他们有意无意地迷失了自己。在这一意义上，作者似乎在揭示：一直以来，男人的故事被天然地视为“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只是“女人”的故事。但作者的笔下，男人与女人同时站在“人”的意义上，平等地面对命运的分叉，而后分道扬镳。同样，也只有女性能够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尊重、欣赏、疼惜与怜怜。《毛纺厂在西北偏北》中的韩斯娇与玛依拉，《女人边锋》中的睿睿与边锋，《复调喀秋莎》中的吕心韵与艾四萍，《不忘》中的金燕与梅楠，无不如此。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几篇小说中都隐含着一种镜像关系：成年女性对少女的凝望与回想。穿越时光隧道，玛依拉们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一刻，“心里涌起千万怜惜”。至此，我们仿佛确切地知晓了作者在怀念岁月里的什么，让她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究竟是什么——是那个还未与命运狭路相逢、对未来充满幻想的自己，是那个与自己血脉相连、正在恣意生长的少女。

最后，还是要说一说《五秒钟是什么概念》这篇小说。在整部集子中，它似乎承担了另一种功能：一种明确展示“短篇小说”为何物的游戏性尝试，一种高度调动读者神经的畅快体验。它充分凸显了“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本体意义，也将锦璐创作中冷静、幽默乃至“刻薄”的风格放大到极致。综观锦璐的小说，这一面或许就一直若隐若现地埋伏在她的创作中，或许这正是她观看世界、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如她自己所剖白的：“我学习着冷面但又热情地看待世界”，“用理性的冰与感情的火，打造淬炼成写作的钥匙”。

（作者系《广西文学》编辑）

# 学与识的有机统一

——读邹世奇散文集《只向花低头》

□徐可

邹世奇是文学博士出身，但她没有从事学术研究，而是钟情于文学创作。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不务正业了，其实不然，她的所学没有白费，而是融进了她的散文创作中。散文集《只向花低头》就体现了她学与识的有机统一。

《只向花低头》这本书中很大一部分是读书随笔，或者叫书话，这些文章写作正是基于作者的学术背景。书话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写书话首先要有广泛的阅读和渊博的知识。如果你总只读几本书，眼界就不可能太高，也很难识别书话的优劣。其次要进得去、出得来，做到“言在书中，意在书外”。书话不是书评，不是要对所读之书进行评价，而是由读书而有所感悟，借读书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读邹世奇的《只向花低头》，我发现她的阅读面非常广泛，既有古典文学和世界名著，也有当下的优秀作品。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读书随笔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例如书中有关《红楼梦》的那些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点。《红楼梦》自诞生以来，有关它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停